

展望 2030 年代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

暂译版、部分修改稿

2009 年 3 月

财团法人 世界和平研究所

1、这次金融危机的本质与课题

(世界金融危机的本质及其影响)

以 2008 年 9 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为契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陷入更为混乱的局面,人们普遍认为已形成一场百年不遇的重大危机。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萧条不仅影响到金融领域,而且危机的震源国美国等的汽车产业以及各国的支柱产业受到严重打击,开始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由于这场危机是在高度全球化的市场里爆发的,其影响很快传遍世界各国,给亚洲国家也带来了冲击。日本在经济急速恶化、企业和劳动市场深受影响的情况下,2009 年经济增长率很可能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负增长,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其实,这场金融危机是在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金融资本主义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金融技术通过资产证券化(如住房贷款等)极端高度化,交易规则与信息披露等全球市场的培育和监管体系的建设滞后,以及美国等各国市场监管体系管制存在种种漏洞所导致的。金融交易的发展本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在相应的市场监管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却有可能造成重大扭曲,使经济陷入一片大混乱。在这次危机中上述担忧都已成真。全球经济失衡和亚洲直接融资市场的不成熟使得冲击进一步加剧。

正如过去多次泡沫现象所暴露的那样,市场不成熟往往导致风险管理不严和过于乐观的预期等问题,资产价格因为脱离实体经济而大幅度跌落,不得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其实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非从未有过,日本也不例外。上世纪 80 年代,资产价格一路飙升后又急速暴跌酝酿了 90 年代以后的低速增长,使得日本陷入所谓“失落的十年”。近 20 年来,包括进入 2000 年以来,日本经济从未全面复苏过。世界虽然对日本近期经历的磨难记忆犹新,但在短短的 20 年内却再度引起了同样的现象。

况且,这场金融危机造成了历次危机完全无法比拟的天文数的惨重损失,使世

界经济陷入了严重混乱。投资银行在运用新型金融技术和金融商品的过程中, 杠杆率(依存于外债)被推高至过高的水平, 不仅给银行部门, 而且通过资产证券化给全球市场带来了负面影响。结果, 目前仍无法把握全球损失究竟多少。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8年10月的推算, 这场危机给银行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和1990年代日本同样的规模(约0.8万亿美元), 再把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蒙受的损失也算进来, 损失总额将高出一倍(约1.4万亿美元)。据IMF在2009年1月的最新推算, 金融机构的损失已扩大到2.2万亿美元。另据英格兰银行的估算, 损失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 远远超过1990年代日本的不良资产总额。经济混乱仍在造成不良资产, 致使经济进一步下滑, 在这一恶性循环还在持续的情况下, 损失总额很有可能大大超过目前的估算。

(短期课题: 建立披露和监管不良资产的机制)

为了克服这场危机, 通过恢复经受创伤的金融体系、解决失去住房和工作的低收入群体问题、创造就业机会以及采取刺激经济对策, 从而促进世界经济重新回到正轨是当务之急。从短期来看, 最重要的是让更多的市场人士确信“经济不会再走下坡”和“不良资产不会再增加”, 并增加安全感。其重要指标之一则是引发这场危机的美国住房价格动态。在危机尚不见底的情况下, 难以提振市场信心, 无法打破经济混乱和不良资产增多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应对货币金融危机, 主要国家屡经讨论, 于去年11月首次召开了金融峰会。但所提出的应对方案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场危机。为了解决危机所带来的问题, 应尽快建立和落实国际机制, 及时掌握和彻底披露因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不良资产, 并把它置于金融当局的有效监管之下。

如果经济永不见底, 就会产生一种落入无底深渊的恐惧感, 无可消除不安心理。所以, 即使损失规模远超过预期也要如实公布损失大小, 这是克服危机的第一步。回顾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 1998年度进行注资以后收到效果, 是因为金

融当局开始彻底公开不良资产信息和加强监管之故。

在这基础上，要把收购不良资产、增加流动性、提高存款保险上限、促进银行合并等一切政策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尽快且有效地处置不良资产，通过国际协调全力恢复经受创伤的金融体系。一般认为完成这项处置工作至少需要若干年。

这次危机暴露出了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各国国内金融监管体系的不善，从而助长了经济混乱。在金融工具迅速高度化和金融交易不断国际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有效进行金融监管的新的国际框架。否则，即使继续处置了不良资产，也极有可能再度引发同样的危机。这是从这次危机中汲取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中长期课题:重建国际经济、金融体系)

这场危机将对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影响，需要尽快采取措施缓解当前的混乱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次危机和历次经济危机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即这场危机虽然引发了金融危机需要善后处置，但是它又具有对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进行历史性变革的潜力。缺乏远见，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度引发危机。可见，长远的、全球的、站在历史高度的战略是十分必要的。

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看来，这次金融危机让人们重新思考了市场问题。市场经济虽然是现阶段人类所创造的弊端最少的一种经济体制，但是很早就有“市场缺陷”或“市场失败”等意见。此次危机是“市场失败”的一种实际表现。对此，尽快完善机制，保障市场经济顺利运作，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而降低参与成本、规范市场交易、以强制力量促进遵守规则、解决信息不对称(信息仅在部分市场参与者手里)等都是保障市场经济顺利运作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次危机正是因为缺乏上述因素，市场未能正常运作导致的。市场就像公共产品，虽然平常很少在意市场形成过程及其成本，但打造市场环境其实需要付出巨额成本。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交易的国际化与复杂化，上述成本正在在迅速上升。战

后 60 多年来, 营造全球市场环境, 包括供应基轴货币都由超级大国美国完成。比如, 奠定战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也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得以形成和维持的。然而, 为维护市场体系一向承担成本的美国经济已经相对削弱, 金融交易技术的迅猛发展又大大增加了监管国际交易的难度。由于单靠美国不能再支撑全球市场, 某一地区发生的金融市场混乱又很快传遍全球, 这场危机充分显示了创建区域性金融监管和支持体系的必要性。

针对当前的新情况, 不仅在全球市场, 而且在区域市场和各国国内市场建立多层次的体系将是有效途径, 而打造全球市场环境所需要的成本应由基轴货币国家和世界各国共同分担。

(创建开放的、多层次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

面对全球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 为了实现全球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创建一个开放的、多层次(全球、区域、各国)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 有必要在全球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形成由若干国家构成的区域市场, 加强对区域市场更具效率和效果的监管功能, 建立该区域应对经济危机的支持体系。创建这种多层次的体系将有助于完善全球市场, 也有利于世界。所创建的区域经济、金融体系应该是开放的, 并不意味着形成像上世纪 30 年代那样的区域集团化。它将是与全球市场相协调的、弥补全球市场的体系。

从上述观点出发, 为实现亚洲的持续稳定发展, 应该考虑创建亚洲共同货币, 为此力争建设具有互补性的多层次(全球、区域、各国)的架构, 形成与美元、欧元三足鼎立的亚洲第三极, 以防范全球市场再次爆发危机。亚洲正在深化纵横交错的贸易和资本交易, 加深相互依存关系, 然而大多以美元结算的环境却加大了因亚洲以外的其他区域经济大起大落而蒙受重大影响的脆弱性。亚洲地区正在致力消除贸易和资本交易的种种障碍, 而通过第三极的形成降低汇兑风险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为实现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基轴货币美元的存在依然是重要的,美元还将继续保持现有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在亚洲形成第三极,并不是取代现有基轴货币体制,而是要和欧元共同弥补以美元为基轴的货币体制。当然,新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不可能一朝一夕即可建成。在世界正要顺着新的潮流发展的今天,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加强本区域的政治协调。

2、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应有模式和亚洲地区的未来

(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化和布雷顿森林体制)

遭受这场危机后的中长期课题是创建开放的、多层次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需要思考的前提是,战后一直作世界经济栋梁的美国经济正在相对削弱这一现实。战后美国主导的所谓布雷顿森林体制(IMF、世界银行体制)这一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随之将面临调整变化的需要。

在展望未来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之前,首先分析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功与过,并从中汲取教训是至关重要的。狭义的布雷顿森林体制是指自1944年至1971年实施固定汇率制的IMF、世界银行体制;从广义上讲的布雷顿森林体制还应包括继承和发扬该体制的现有体制。

布雷顿森林体制是基于对二战前国际贸易和资本交易的保护主义规定引起各国利益冲突,甚至引发战争的反省而建立起来的。吸取这一教训,为实现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而创立了IMF、世界银行等组织。

在1971年之前,美元是唯一的基轴货币,它与黄金价格挂钩,成为各国币值的货币锚(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1971年尼克松冲击爆发,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一改固定汇率制为浮动汇率制。在这情况下,在德法两国首脑的带动下,欧洲开始萌发了具体探索创建共同货币的苗头。1979年,欧洲各国的货币过渡到了欧洲货币单位(ECU)-即加入欧洲货币体系(EMS)币种的加权平均值和美元保持币

值稳定的联合浮动汇率制。在 20 年后的 1999 年，欧洲实现了共同货币-欧元，目前由欧盟 16 个国家采用。

（布雷顿森林体制的正面因素）

广义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在一些重要方面为世界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的体系下，不仅维护了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还提高了国际贸易和资本交易的效率，从而为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日本和欧洲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背景下，作为国际交易结算工具，美元被各国普遍采用。但是一旦被采用，因为网络外部性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就不易形成不同币种之间的竞争。作为基轴货币美元也有一种惯性（即一旦被使用后，其后易于继续得以采用），美元先后克服向浮动汇率制的过渡以及亚洲货币危机等重重困难，今天依然保持着基轴货币的地位。

第二、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中，和以稳定币值为己任的 IMF 并驾齐驱的世界银行为市场经济体系在全球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一般认为实行市场经济有助于改善经济效率，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再加上，在与 IMF、世界银行共同推动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 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下，自由贸易取得了发展，贸易利益形成了推动战后经济显著发展的原动力。

（布雷顿森林体制的负面因素）

布雷顿森林体制虽然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着负面因素。

第一、在以复数货币为中心的体系下，不同币种之间自然产生竞争，为稳定各国货币对外币值可以起到自律作用。但是由于美国独占了国际货币地位，因而

想让美元保持对外币值的稳定却起不到自律作用。这样,世界时而受到美国国内问题或国内政策的影响。

由于各国的贸易和资本交易大多以美元进行结算,正像这次金融危机,一旦陷入流动性危机,就急需类似于全球央行的国际组织作为最后一个堡垒提供贷款。然而 IMF 或类似于 IMF 的国际组织都没有充分的能力去这样做,美国也未能提供充分的支持。此外,也有指责 IMF 的援助过分偏向于与美国经济关系密切的拉美国家等批评意见。

第二、在市场经济发展扩大的背后,全球的差距也在拉大。在一味追求效率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拉大差距在所难免,但不少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而处于被遗忘的角落。本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因地区、历史的不同而不同,不可能是千篇一律。而战后在世界普及的恰恰是美国式市场经济,未必适合其他国家的经济。不考虑区域特征,把美国式市场经济强加于他国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和更大的经济混乱,反而阻碍了发展。这一问题在以美国式市场经济的渗透为背景造成世界经济大混乱的这场危机中被充分暴露出来。

(展望今后 20 年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的两种方向)

展望今后 20 年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大体上有以下两种方向。这两种方向是基于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对减弱,仅靠美国一个国家,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难以为继的情况而提出的。以下两种方向也不是两者选一,彼此有着互补关系。但两者之间重点不同,其含义也不同。

首先,当前最有可能的方向是对现有 IMF、世界银行体系进行改革,由若干国家共同增强和扩大其职能,以共克这场危机。具体来说,扩大各国对 IMF 的出资和融资规模,加强金融监管指针,由一些主要国家的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SDR(即 IMF 特别提款权)作为基轴货币取代美元。把 SDR 作为基轴货币显然不是以某一特定货币作为单一基轴货币,而是试图由一些主要国家的货币共同支持来实现。为了推动

这一改革而提出新的政治框架就是由七国集团和新兴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共同主导的体制。

第二种方向与对现有体系进行部分改革的上述方向不同, 试图构建复数基轴货币体系。具体来讲, 除美元和欧元之外, 再创建亚洲共同货币, 在亚洲形成第三极, 与欧美地区优势互补, 共同支撑世界经济。复数货币体系尽管有兑换效率较低等弊端, 但是由于货币之间产生竞争, 有利于稳定本币的对外币值。作为对各国央行提供资金的最后一个堡垒, 基轴货币国家不仅在采用共同货币的各国之间, 而且在和采用其他基轴货币的其他基轴货币国家之间自然发挥协调作用, 这样, 对外货币政策也将发挥自律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的大潮流和增长中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 亚洲形成共同的政治意愿, 为共克危机付出努力是十分重要的。为此, 加强以美元为主的现有体系固然重要, 而在亚洲形成第三极来弥补现有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基轴货币体系是有一种惯性的, 不可能一下子转向复数基轴货币体系。同时, 创建共同货币还有许多环节需要调整, 如推动各国政治对话, 加强财政金融、经济政策的协调, 建立监管区域内宏观经济和金融动态的机制, 启动和利用共同货币单位等等。

(创建亚洲共同货币“ASIO”的进程)

创建亚洲共同货币, 最好以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日本和中国为核心, 并与韩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沟通协调来扩大合作。

但是, 亚洲国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都具有多样性。从基轴货币的惯性、区域内协调机制的建设、制度协调和利益调整等前提来看, 亚洲共同货币的形成还有许多环节要走。

欧洲推动煤钢共同体等围绕货物的国际整合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 从此再经过服务、人才的流动化一直到 1999 年欧元的诞生, 经过约半个世纪才实现了货币统

一。因为有着两次世界大战惨痛经历的欧洲,其背后有个希望通过建立一种机制,避免欧洲各国重演悲剧的政治意图,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过程中,以各种制度建设促进了整合。

与此相对地,在亚洲以东盟国家为首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区域内各国以市场为主导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不断加深。虽然日中韩三国迄今未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制度建设不要像欧洲那样一步到位,而要从有条件的国家、地区和领域着手,采用渐进式整合较为妥当。从长远看,为了实现亚洲共同货币一步步克服种种困难,势必成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巨大驱动力。

建立亚洲共同货币是一项长期工程,实现这一工程需要区域内坚定的政治意愿和充分的时间与人力。为此要把建立共同货币定为最高目标,在研究如何推动时,按照需要建设完善配套的金融、贸易及其他经济体系。今后 20 年是个创建共同货币的准备阶段,应把精力放在配套体系的建设上。

面对这场金融危机,首先需要建立多层次的、新的金融监管和支持体系。这场危机爆发后,虽然对发展金融交易存有否定意见,但限制了金融发展会造成矫枉过正。金融可以把资本主义的血液—资金在同一个时空或着跨越不同的时空,从过剩领域输往短缺领域,从而大大提高经济效率。因此,在新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下,需要重新打造市场经济基础,特别要全力构建一种框架,确保市场信息正常流通,限制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被操纵的情况下交易成立。在这情况下,首先要把亚洲建成世界第三极,同时还要加强现有 IMF 和世界银行体系,并以 G20 为基础重构新的框架。

在此基础上,不仅要建立全球体系,而且要建立适合区域特征的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譬如说,清迈倡议的重构以及增强亚洲开发银行职能都势在必行。吸取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亚洲货币危机的教训所建立起来的清迈倡议,共签署了 300 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但由于其中 80%竟与 IMF 的贷款挂钩,对亚洲国家看来不够便利。因此,有必要通过清迈倡议的重构和增强亚洲开发银行职能,建立亚洲的融资、金

融支持机制。以发展符合亚洲区域特征的金融为前提，要致力创建与世界金融体系相协调的、开放的体系。

鉴于创建 IMF 和世界银行的预期目的，也有应该实现开发与金融一体化(即建立全球央行)的主张。基于这一观点，亚洲也可探讨同样的目标。

加强建设亚洲的金融监管和支持体系是实现亚洲共同货币的第一步，即巩固基础的阶段。第二步要推动各国政府的对话，协调各国财政经济政策。同时还要启动包括日元、人民币、韩元及其他亚洲货币在内的亚洲货币单位(ACU)，必须增强它的利用实效。在与全球体系进行协调的同时，还要建立旨在监管本区域宏观经济和金融动态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形成 ACU 结算机制等金融体系框架，建设一个推动贸易、服务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自由化的框架。只有做出种种努力，亚洲共同货币才能实现。

(作为第三极的亚洲共同货币“ASIO”及其对本区域的积极意义)

创建亚洲共同货币，在经济、政治方面对亚洲国家有许多积极意义。经济方面的积极意义体现在：通过贸易和资本交易提高区域经济的效率，稳定区域经济。在亚洲，区域内跨国贸易逐年扩大，生产网络密布，区域内关税水平大幅下降，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但是，由于交易大多用美元进行，正如上次亚洲货币危机所暴露的那样，因受汇率波动的影响亚洲国家经济蒙受冲击的脆弱性依然在增加。在欧洲，这次危机中如英国、爱尔兰等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的货币贬值大于欧元贬值。可见，加入有规模的货币联盟，蒙受冲击的风险即可变小。为了减少汇率风险(汇兑成本)所带来的脆弱性，创建共同货币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在亚洲，由于各国国内债券市场不发达，大部分国内存款往往形成先向国际金融中心流出后再向本国还流的结构。本区域内的资本交易，甚至是本国国内投资也大多用美元进行，这就导致“币种”、“届满期”的双重不一致，致使亚洲国家适应区域外经济变化的脆弱性增加。不止于此，这一结构还助长了用亚洲过多的储蓄

添补美国经常收支亏损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创建亚洲共同货币后,既可以用本区域的货币发债,也可以缓解区域外的汇率波动带来的脆弱性,有望扭转全球经济失衡局面。

再者,在实现亚洲共同货币的进程中,亚洲主动建设亚洲自己的金融监管、支持体系不仅有利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更加巩固,也有利于发展适合亚洲区域特性的市场经济。

政治方面的积极意义体现在:促进区域内的相互理解和政治协调的顺利进行,也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亚洲”意识(Identity)。引入亚洲共同货币,参与国不仅可以加强经济上的联系,还可以增强政治方面的团结协作。由于政治关系的不和谐影响稳定本国货币对外币值,如在亚洲形成第三极,即可作为本区域的“货币锚”而起到保持本区域政治稳定的作用。尽管实现这一目标还有许多共同难题需要解决,但在进行政治协调的过程中,可以深化相互理解,加深各国团结。为了实现亚洲共同货币而实现政治、行政的磋商和协调机制化,定能促进更为顺畅的政治协调。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和深化区域内对话,而且有利于维护亚洲地区的稳定,在政治和外交上也具有积极意义。

欧洲已实现了欧洲货币欧元,为此它们抛开各国的个别利益,为实现欧洲更高层次的公共利益而进行了政治协调。欧洲共同货币欧元的诞生,透过欧元在各国的流通,形成了共同的“欧洲”意识。相信亚洲共同货币的诞生也将促成共同的“亚洲”意识。

在国际规则的形成问题上,由于以往亚洲地区一直没有各国共商共识的机制,始终未能充分发挥亚洲的潜力。若在亚洲区域内促进更为顺畅的政治协调、形成共同的“亚洲”意识,那么就像欧洲一样,亚洲也可以形成政治共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易于表达亚洲共同的政治意愿。

(创建亚洲共同货币“ASIO”对全球的积极意义)

创建亚洲共同货币对于亚洲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具有经济、政治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在经济方面，因为亚洲地区的发展效率和稳定性有所提高，亚洲将成为对欧美国家颇有前景的市场。同时，因为在经济总量较小的国家里流通的是经济总量大的货币，这样，像亚洲货币危机或类似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危机不易再发，这既有利于稳定亚洲和亚洲以外其他地区的贸易和资本交易，也有利于提高全球经济的稳定性。

在美国经济相对化的情况下，也有观点认为欧元的诞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实现亚洲共同货币区，和欧元共同弥补以美元为国际基轴货币的体系，这不仅有利于稳定经济交易和世界经济的顺利发展，而且对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的经济也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进而可以提高全球币值的稳定性，对各国的对外货币政策也能发挥自律作用。

在引入共同货币的进程中，区域内的贸易、资本交易和经济自由化进程将取得飞跃发展，这有利于区域内国家和欧美国家大大进入亚洲市场，也有利于加快世界贸易和资本交易的自由化。

关于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有人说那是因为亚洲(尤其是日本和中国)过多的储蓄以美元资产的形式流入世界金融中心，扩大了全球经常收支的不平衡，引起了全球泡沫的缘故。创建亚洲共同货币可以为区域内直接运用过多储蓄提供有效手段。

其次在政治方面，共同货币作为本区域政治机制的“货币锚”，可以抑制区域内政治对立的发生，促进亚洲的政治稳定，也有利于世界的政治稳定。具体来讲，因为共同货币需要稳定对外币值，在区域内有摩擦的国家之间政治协调会变得比较顺畅，区域内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和政治相互依存也有望得到加深。

此外，伴随共同货币的引入，多层次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这样，各国的对外行动不会只顾本国利益，而会考虑本区域各国的共同利益。同样地，当亚洲国家

同区域外国家进行谈判时,亚洲各国也将基于区域内多边协调开展更为合理、集中的谈判。

此外,在创建共同货币的进程中,区域内各国需要协调财政金融和经济政策,提高本国作出政治决策和拟定政策程序的透明度,这将有助于推动本区域各国的民主化和自由化。

日本是个制定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等经济政策的程序有着明确规范和透明度的国家,作为长期奉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的国家,日本和欧美国家有着共同价值观。中国也在实行市场经济,和美国的经贸关系不断加深,作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方中国正在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实现亚洲共同货币,由具有经济规模的国家拿出坚定的政治意愿去协调推动是尤为重要的。日中两国主动参与建设框架而统一步调,对保持全球稳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为实现世界经济的更加稳定与发展日本应该发挥的作用)

当然,仅以货币手段指望世界经济的长期稳定与发展是不现实的。既然没有世界政府,那么国际协调只能靠共同价值来应对。尽管自由、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三个因素将构成今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但它们不过是必要条件。所以说,有必要和世界银行等现有国际组织加强合作。特别是环境保护、开发援助、振兴科技等一直是日本的强项,最好把这些领域作为共同价值去共同追求。不久前美国实现政权更迭应该说是很好的机遇。

日本首先应该积极利用上世纪 90 年代亲历金融危机所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为创建新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作出贡献,同时也为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在环保和科技领域多作贡献。

正如全球变暖问题所显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不考虑环境保护无法维持长远发展的阶段。今天,有必要围绕环保议题重建世界经济,树立注重环保的价值观。日本既有巨额外汇储备和储蓄,也有环保、科技、人力资源(包括高等教育和伦理

道德)等的巨大优势。环保技术是日本在世界上值得自豪的、最先进的领域,它将为解决需由全世界共同应对的全球环境问题提供技术基础。

然而,在世界各国都要认真对待全球环境问题的时候,将日本现有的环保技术简单地转让给发展中国家是不够的,有必要构建一种减轻环境负荷的框架来解决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加大的环境负荷问题。为此,诸如在建设统一的排放权交易市场、根据环保力度的大小对进出口产品课征关税(开征环保关税)等建立一种把环保成本转嫁于产品价格的机制方面,日本应该起到主导作用。

为此目的,尤其在环保、科技、金融等领域,要面向全球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专业人材,作实实在在的贡献。日本人素有珍惜环境、注重高度伦理道德和长远眼光的市场主义悠久传统。江户时代的东京在环保方面就已形成世界高水平的循环型社会。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认为:“国家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据仁义道德”。在这悠久传统的背景下,日本正需要站在长远的、全球的、历史的高度提出日本独有的战略。

3、展望今后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日本的作用(进度表)

(短期课题)

需在2009年内解决的短期课题是:构建一个国际体系,全面掌握和彻底披露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不良资产,将其置于金融当局强有力的监管下。令人遗憾的是去年11月召开的首届金融峰会对这点做得不彻底。将于今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金融峰会应该就彻底披露和监管不良资产而制定各方共同遵循的规则和建立有效机制达成共识。应在这基础上在2009年内研究落实技术性细节。

2010年代前期(2010—2014年)将是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阶段。虽然多数观点认为引发此次危机的美国房地产价格跌落持续到2010年,但经济衰退一旦长期化,经济触底的时间就有可能进一步拖后。至少当市场人士一致认为美国房地产价格已经降到谷底,普遍确信房市不再恶化的时候,才是一个转折点。据此再通过注入

资本、收购不良资产、增加流动性、提高存款保险上限、促进金融机构的合并等一切政策手段的有机结合，保持国际协调进行有效处置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基于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反省，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支持体系和统一监管标准也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一观点出发，要加强现有 IMF 和世界银行体系，完善 G20 的新框架。与此同时，还要通过清迈倡议的重构和加强亚洲开发银行的职能，完善及时援助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的体系，进而推动亚洲地区的金融监管、支持体系建设。为此，日本应该积极利用上世纪 90 年代的经验 and 知识，向世界传播教训，为解决金融危机提供线索，同时利用雄厚的外汇储备向陷入资金紧缺的国家灵活地提供流动性。

2010 年代，世界经济将走出最困难的时期。但在处置不良资产的阶段里经济资源往往被用于处置历史债务上，难以为未来的经济行为投入。另外，由于患有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市场信心萎缩，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活动一时难以恢复。因此除非有强大的力量积极带动，经济复苏的步伐只能很缓慢。尽管如此，日本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经验证明，此时一定会萌生下一论发展的苗头，因此这段时期也是审时度势，把握这一迹象的阶段。为此日本应该在世界率先复苏经济，为构建新的金融体系作出贡献。

(中长期课题)

在完成上述短期课题的同时，还要从中长期的视角出发，按照以下三个步骤推动如下课题：2010 年代构建区域内协调机制；2020 年代创建亚洲共同货币单位 (ACU)；进入 2030 年代以后实现亚洲共同货币。

(2010 年代：第一阶段=构建本区域内协调机制)

作为第一阶段，2010 年代要构建区域内协调机制。作为政治课题，首先应由日中韩就实现亚洲共同货币的第一步骤—创建亚洲共同货币单位 (ACU: Asian

Currency Unit) 达成具体共识。要以三国取得的共识为基础, 成立亚洲国家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开展具体讨论, 将实现亚洲共同货币单位的有关举措扩大到以东盟为首的其他亚洲国家去。在建立这一框架的过程中, 要加强各国财政金融、经济政策的协调, 完善对区域内宏观经济、金融动态的监管, 建立金融支持体系。作为经济课题, 要促进各国货币的可兑换性, 尽力减少汇兑限制, 采用浮动汇率制, 确保中央银行独立性等, 为实现亚洲共同货币单位要打造环境。同时, 还要促进在包括日中韩在内的本区域各方签署 EPA 和 FTA, 消除区域内阻碍资本自由流动的因素, 培育亚洲资本市场, 加强其建设。

为了有力推动上述事宜, 2010 年日本政府将在政府内成立《亚洲共同货币制度》推进本部, 落实创建亚洲共同货币的具体工作。并且据此呼吁在 2010 年前期的较早时期启动日中韩经济部长定期磋商, 就实现第二阶段所必要的亚洲共同货币单位的方向在三国间力争取得共识。在此基础上, 为了把该构想推广到以东盟为首的其他亚洲国家, 呼吁召开亚洲国家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 成立亚洲共同货币制度专家小组, 找出技术性课题, 着手研究解决方策。此外, 日本还要为实现亚洲共同货币单位争取欧美的理解, 加强和支持对财政纪律等区域内宏观经济、金融动态的监管。同时, 为了使本区域各国实现自由化, 应支持结构调整, 推动放宽外汇管制, 促进亚洲各国(特别是日中韩)签署 EPA 和 FTA。为了促进亚洲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 日本还要在发行武士债或以亚洲国家的货币计价的债券、培育和加强东京市场、建立区域内工商网络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积极支持。

总之, 纵观 2010 年代, 可以说这是为了在第二阶段启动亚洲共同货币单位(ACU)和在第三阶段启动亚洲共同货币奠定基础 and 作准备的阶段。

(2020 年代:第二阶段=启动亚洲共同货币单位 (ACU))

2020 年代的最大目标是启动亚洲共同货币单位。本货币单位最好囊括日元、人民币、韩元以及东盟国家等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在实现亚洲货币单位的同时,还要推动国际贸易和资本交易的区域整合。

为此,要成立亚洲货币组织作为亚洲中央银行的前身,以实现亚洲共同货币单位 (ACU)。在这基础上,还应明确参与国作出政治决策和拟定政策的程序,促进民主化和自由化。在经济方面,收敛区域内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缩小汇率波幅。此外,应建立 ACU 结算机制,促进民间部门采用 ACU 和国际组织以亚洲共同货币单位发债,从而提高亚洲共同货币单位的实效。此时,除了对贸易以外,对服务领域的跨国交易自由化和熟练工的流动问题也要开展研究。

日本应致力加快上述进程。首先利用日本的外汇储备,向新成立的亚洲货币组织积极出资。呼吁将亚洲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的定期会议升格为首脑级亚洲峰会。为了提高 ACU 的实效,还将提供给亚洲区域内的日元贷款改为以 ACU 计价的贷款,积极促进以 ACU 发行公债、以 ACU 运用养老金基金等国内储蓄,并以 ACU 进行国内外投资。

2020 年代是面向 2030 年实现亚洲共同货币的最后调整时期。要继续推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体系的国际协调。同时力争取得亚洲以外的欧美国家的共识。

(进入 2030 年代以后:第三阶段=创建亚洲共同货币 “ASIO”)

进入 2030 年以后是实现亚洲共同货币的第三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首先基于进入 2030 年代前所打造的环境,参与国就启动共同货币事宜在国内形成共识。譬如在建立欧元的进程中,个别国家因未能取得国内共识而放弃加入欧元区。关于启动共同货币的优缺点应该作出充分的说明,据此各国可以用充分的时间形成共识。等到各国形成共识后,将货币主权移交到亚洲中央银行,并创建亚洲共同货币。

为此在一定期限内,把汇率暂时固定下来,确定亚洲共同货币和各国货币的汇价后,再由亚洲央行实施统一的金融政策,正式启动单一货币。

为了加快亚洲共同货币的启动,日本应在亚洲率先取得国民共识,为引入亚洲共同货币统一认识。作为具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悠久传统的国家,日本也要为取得欧美对亚洲共同货币的理解而尽力。

实现亚洲共同货币是个 50 年大计。展望 21 世纪的世界形势,亚洲日渐成为世界的中心。能否实现亚洲地区政治经济的稳定是攸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所在。

实现共同货币虽有种种障碍,但只要以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克服困难,打造亚洲共同的象征,就不仅可以给亚洲的下一代人,而且可以给全世界的下一代人带来希望。今天正因为处在前景渺茫的危机中,我们更应该在国民中激起讨论,唤起对未来的希望。

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展望	日本的作用
<短期课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2009年内：掌握和披露不良资产损失、建立监管体系的国际框架 ● 2010年—14年：集中处理不良资产时期。全面复苏经济，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监管和支持体系、统一监管标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积极利用90年代日本的经验和知识 ● 动用日本外汇储备增加流动性 ● 重构清迈倡议、增强亚洲开发银行职能 ● 在全球率先复苏经济、扩大内需
<中长期课题>	
○ 2010年代：第一阶段=建立区域协调机制	
<p>(政治课题)</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中韩为实现亚洲共同货币单位取得共识 ● 以日中韩和东盟为中心成立亚洲国家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 ● 加强各国财政金融、经济政策协调，建立区域内宏观经济、金融动态监管职能 <p>(经济课题)</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为实现亚洲共同货币单位打造环境(促进各国货币在市场的可兑换性、减少外汇限制、向浮动汇率制过渡、确保央行独立性)。 ● 促进区域内签署EPA、FTA ● 消除区域内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培育和加强亚洲资本市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2010年：在政府内成立《亚洲共同货币制度》推进本部 ● 启动日中韩经济部长定期磋商 ● 启动亚洲国家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成立亚洲共同货币制度专家小组 ● 加强和支持对财政纪律等区域内宏观经济和金融动态的监管机能 ● 为本区域各国实现自由化而支持结构调整，放宽汇兑限制。 ● 为建立亚洲共同货币单位力争欧美的理解。 ● 促进和亚洲各国签署EPA和FTA(特别是日中韩) <p>培育和加强东京市场(包括支持发行武士债和以亚洲各国的货币计价的债券)，支持完善区域内工商网络</p>
○ 2020年代：第二阶段=实现亚洲共同货币单位(ACU)	
<p>(政治课题)</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作为亚洲中央银行的前身成立亚洲货币组织，实现亚洲共同货币 ● 明确政治决策和拟定政策程序，促进民主化和自由化 <p>(经济课题)</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收敛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 ● 缩小汇率波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向亚洲货币组织出资(动用日本保有的外汇储备) ● 启动亚洲峰会 ● 将向亚洲区域内提供的日元贷款改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建立 ACU 结算机制 ● 促进民间采用 ACU, 促进国际组织用亚洲共同货币单位发债 ● 实现服务跨国交易自由化和熟练工的流动化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以亚洲共同货币单位计价的贷款</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促进以 ACU 发行公债, 促进在东京市场以 ACU 进行国内外投资(包括国内储蓄的运用)
<p>○ 进入 2030 年代以后: 第三阶段=实现亚洲共同货币 “ASIO”</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为建立共同货币取得国内共识。 ● 将货币主权由各成员国转移至亚洲央行, 创建亚洲共同货币 ● 亚洲央行实施统一的金融政策, 启动单一货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就创建共同货币在亚洲率先形成国民共识 ● 为启动亚洲共同货币取得欧美的理解